

# 生态女性主义视野中的《女勇士》

宋 阳

(华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摘要】**本文从生态女性主义批评角度解读了汤亭亭的《女勇士》,认为书中多个女性形象——“无名女人”、“疯女人”、母亲勇兰和“我”——体现了女性与自然在符号上、地位上、象征上和经验上的联系,而花木兰这一形象则体现了汤亭亭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自然与人类,男性与女性是相互补充、相互融合、平等共存的统一体。

**【关键词】**汤亭亭;生态女性主义;自然;女性

**【中图分类号】**I71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08)02-0041-04

美国华裔女作家汤亭亭(Maxine Hong Kingston)的成名作《女勇士》(The Woman Warrior)在美国当代文学中占有重要位置,获得了美国国家图书奖等多项大奖,是备受关注的多元文化中的经典性文本。于上个世纪末进入文学研究领域的生态女性主义批评(Ecofeminism)为研究《女勇士》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

## 一 生态女性主义

生态女性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妇女解放运动和环境保护运动的产物,这一名词最早由法国女性主义学者弗朗索瓦·德·奥波尼(Francoise d'Eaubonne)于1974年在其著作《女性或死亡》(Le Feminisme ou La Mort)中提出的。后期随着生态批评(Ecocriticism)在20世纪90年代进入文学研究领域,一些生态女性主义者也开始在文学领域内对自然和性别问题进行考察和研究。

生态女性主义者使用生态学的整体性原则,也就是巴里·柯曼纳(Barry Commoner)的生态学第一定律——“万事万物是普遍联系的”,认为导致生态危机和性别歧视的根源是近代绝对人类中心主义和父权制中心文化。<sup>[1]</sup>她们认为应将人类对待自然界的态度和父权制中心文化对女性的态度联系起来,因为两者都是男权社会压迫的对象,倡导建立一个两性和谐、物种平等、人类社会与自然万物和谐相处、协调发展的社会。在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中,自然与女性有着特殊的联系:首先,在各国的传统文化中,人们都将自然,特别是大地比作母亲,因为自然环境的循环生产能力和女性的孕育后代的能力极其相似;其次,自然和女性都饱受男权社会的二元对立论之苦。男权社会所建构出的人与自然、男性与女性的对立关系,将自然和女性边缘化,使其最终沦为被压迫的“他者”;最后,性别歧视与自然歧视之间以及女性的解放与自然的解

放之间有着社会逻辑的、历史的联系和不可分割性。

作为一门跨学科的理论,生态女性主义批评既是“生态的”,又是“女性的”。生态批评基于生态思想的基本原则,即整体、和谐、多样化又相互依存的原则,批评文学作品是否有助于生态系统的和谐稳定,是否有助于重建人类与自然的和谐,以及是否有助于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均衡。<sup>[2]</sup>在此基础上,生态女权主义批评在生态和女性两个视域内解构和逆写“逻各斯”中心主义。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生态女性主义质疑和颠覆近代绝对对人类中心主义思想,追求整体的、相互关联的和稳定的世界,倡导人类回归自然的天性,建设天人合一的观点;在男性与女性关系方面,生态女性主义试图解构“菲勒斯中心主义”,尊重差异,恢复女性长久以来被扭曲的天性,建构相互补充、融合、平等的两性关系。作为一种新的文化批评理论,生态女性主义的开放性、交叉性和宽泛性为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批评视角。

## 二 女性与自然

汤亭亭的《女勇士》是美国华裔文学的开山之作,张子清先生曾评价:“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华裔文学近年来在美国声誉日隆,与汤亭亭取得的文学成就密不可分。”<sup>[3]</sup>然而,凡是对美国华裔文学有所研究的人都会对著名的“汤赵之争”有所了解:美国华裔文学家和文学批评家赵建秀(Frank Chin)指责汤亭亭是被白人同化的作家,其作品将华裔男性女性化,曲意取悦白人读者。汤亭亭对其指责进行辩白,双方各有支持者。一时间美国华裔文学领域内便形成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论战,被人戏称为“关公战木兰”。笔者认为,生态女性主义批评为解读汤亭亭的作品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希望本文能够使人们免于误读汤亭亭有一些帮助。

《女勇士》一书成功塑造了多个女性形象,本文

试图重点分析“无名女人”、“疯女人”、母亲勇兰和“我”，揭示该书中女性与自然之间符号的、地位的、象征的和经验的联系。并通过花木兰这一形象证明汤亭亭的生态女性主义观点：人类与自然，男性与女性是相互补充，相互融合，平等互助的整体。

《女勇士》的第一章“无名女人”向读者展示了女性与自然符号上的联系，它讲述了“我”从母亲那里听到的姑姑的故事。姑姑新婚之后，她的丈夫便去了美国多年未归，但姑姑却怀了孕。在孩子出生的当天，姑姑家被村民袭击，她受尽辱骂，生下孩子后便抱着婴儿投井自尽。在该章中，“圆”这一图形符号多次出现：“圆圆的月饼，圆圆的门廊，圆圆的餐桌”，“圆圆的窗户和饭碗”，“苍穹”，“水井”……在这里，“圆”不只是形状上的图形，它有四重寓意：它是一个象征圆满和谐的符号；它寄托了村民对美满幸福生活的渴望；它代表着循环往复、生生不息的自然界；它还暗指子宫——生命孕育出生的地方以及坟墓——生命结束后的归所。具体到“无名女人”身上，村民们袭击姑姑家，是因为她“通奸”破坏了村中的和谐圆满以及触犯了封建传统礼教，却没人关心她“通奸”的原因。作者设想了多种可能性：她可能是被强暴，可能是迫于无奈，甚至可能仅仅是根据礼教遵从男子的命令。姑姑也是受害者，但却因为她的女性身份而成为唯一受惩罚的。姑姑向自然寻求庇护：“她冲出了家门，走进了田野，一直到她不再听到这些声音为止”，她“紧紧贴着土地”，在自然中寻得了片刻的宁静和归属感，感觉自己“就是群星中的一颗”。但她最终意识到，因为触犯了村中的禁忌，房屋被毁，家人决心将她永久遗忘，她“紧紧抵着”的土地已经“不再属于她了”，<sup>[4]</sup>封建传统礼教已经扼杀了她与社会和自然的一切纽带。绝望之下，姑姑带着新生的婴儿投井自尽。姑姑是因封建礼教而死，而选择投井自尽则是她对封建礼教的最后反击：村民们企图割断她与自然的联系，她却长眠在水与泥土中；家人故意将她遗忘，她却将自己的血肉与家族的饮用水混合，每当家人饮用这井水，她的血液便再度融入家族，彻底打破了父权制保持纯洁血液的意愿。

如同自然在绝对人类中心主义下面临各种生态危机一样，在父权制中心文化的压迫下，女性的个体性格和行为会发生变异，成为“疯女人”。可以说，自然和女性有着相似的地位——都是他者、附属品、被压迫者。在全书中，汤亭亭刻画了多个疯狂女性形象，其中有代表性的是“河边疯女人”、姨妈月兰和“巫婆皮亚娜”。“河边疯女人”是第三章

“乡村医生”中的一段小插曲，篇幅很小但却意蕴深远。故事发生在母亲勇兰去美国前所在的小山村，村里的疯女人因为戴在头发上的一面小镜子被当作给飞机发轰炸信号的日本奸细，最后被村民用石头砸死。当仔细阅读作品对“河边疯女人”的描写时，我们便会发现她同“无名女人”一样是封建礼教的悲剧。疯女人将小镜子当做发饰，身上是“红红绿绿”的漂亮服饰，快乐地在河边翩翩起舞。这种公然在众人面前展示和追求女性美的行为在饱受儒家父权文化影响的村民眼中无疑是罪大恶极，他们集体用石头砸死了她，还不忘将掉在尸体旁边的小镜子碾得粉碎。追求魅力和展示自我是女性的天性(nature)，而这个天性早已被几千年的“妇容”和“妇德”等律例扼杀了，凡是有人胆敢违抗，人们便将异己者命名为疯子，以便剥夺其话语权和社会身份，这和康德所说的“人是自然的立法者”是一个逻辑。另一个疯狂女性是“我”的姨妈月兰，她软弱、顺从、任凭别人摆布自己的命运。当被告知“没有遮掩你的树，没有草坪能使你脚步声变轻”，<sup>[5]</sup>随后又被丈夫抛弃之后，她就像途中遇到的葡萄树一样，“蜷缩在田间，像侏儒一样”。<sup>[6]</sup>直到她彻底疯了被送进疯人院之后，月兰才在其他疯子身上找到了“知己”：“在这里我们能够互相理解”。<sup>[7]</sup>另一个疯女人是在沼泽被“我”成为“皮亚娜”的“巫婆”，她也只有在疯了之后，身上才能有“一团流动的色彩”：“她‘跑得比燕子还快’，一串一串的白色花团——蒲公英种子在她身后飞舞，宛如一群小精灵在她的头顶翩翩起舞，她身上层层衣物像翅膀一样扑扇着”。<sup>[8]</sup>可以看出，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的失意与惨淡唯有在自然中能得到慰藉与会应，从而强化了女性与自然的相知。

与“疯女人”们截然相反的人物是母亲勇兰。在文中，她与自然是融为一体、互为象征的关系。勇兰是一个自强独立、热爱生活、勇敢坚强的女性。她刻苦学医，还与“压身鬼”斗智斗勇；在乡村时，她因高明的艺术和崇高的责任心而成为远近闻名的乡村医生；与父亲在美国团聚后，她一边照顾家庭，一边又将洗衣店的工作撑了起来；她敢于向父权威挑战，打破父亲“不准说”的禁令，将“无名女人”的故事告诉给了孩子。她对于妹夫将妹妹月兰抛在中国三十年而另结新欢非常愤怒，千方百计将妹妹接到美国，鼓励月兰夺回自己应有的权利。月兰丈夫的诊所是男权制的代表：“没有鸟，没有树，只是一座城市”，在这样的环境下，“勇兰觉得一股疲惫在向下拽她”，但当她下了车之后，她觉得



踏上地面,尽管是水泥地面,她也从中获得了力量……就感到强壮”。<sup>[9]</sup>当妹妹月兰生病之后,勇兰也是一样向自然寻求帮助和能量,她让妹妹晒太阳,到处找草药,还在园子里拔些冬季仍然生长的新鲜植物,选其中最嫩的给妹妹熬成药汤。月兰进疯人院后,勇兰“打开窗,空气和阳光又回来了”。<sup>[10]</sup>在小说中,勇兰就像一个光辉的“太阳”,充满生气,给人以能量和温暖,象征着生生不息的自然界。

作为一个美国华裔女性,小说的叙述者“我”受到白人主流社会和父权制度的双重压迫。“我”总是把自身“想象成轻浮粗暴的孤儿,白皮肤,红头发,骑白马”。<sup>[11]</sup>这一小女孩的设想充分体现了白人文化冲击之下有色人种扭曲的心灵。为了在这个种族歧视根深蒂固的社会文化中寻找自我价值和赢得社会的认可,“我”渴望拥有白种人的外貌体征,因为“白皮肤”才是以白人为主的男权社会的审美标准。有色人种的自然天性已让位于占统治地位的白人文化,人种在自然界中本无任何尊卑区分意义,但在人类社会它变成了社会和文化上的概念,可以说是文化对自然的误读和压迫。除了种族歧视外,“我”还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男尊女卑思想的折磨。当家里的女孩们到一个亲戚家吃饭时,那个远房的曾祖父会“瞪着双大眼”吼道:“蛆虫……全是些蛆虫!”还会“逐个指着我们”说:“蛆!蛆!蛆!蛆!蛆!蛆!”不只这样,连“我”的父母都会说“养女好比养牛鹑鸟”,“宁养呆鹅比养女仔!”<sup>[12]</sup>在这样的双重压迫下,年幼的“我”越来越不爱说话,说话的声音也越来越小,以致成了“公鸭嗓”,这无疑是对人的自然属性的一大伤害。“我”想要反抗,但却不知痛苦的根源,于是决定“我永不嫁人,永不。”<sup>[13]</sup>同时,“我”还效仿男权社会的话语逻辑对追求“我”的那个富有的华人男孩进行了讽刺:他智力迟钝,口舌笨拙,他的腿像“弗兰肯斯坦中的怪物一样僵硬”,是只“呆鹅”,“他坐在那里,腐肉一堆,似乎在放射着细菌,那会降低我的智商。他像一只水蛭,正从我的后脑勺里吸取我的智能。”<sup>[14]</sup>“我”就像心中的英雄花木兰一样,为所有受过侮辱和压迫的华人女性伸张了正义,成功地逆写了男权社会建构

的男尊女卑思想。

### 三 汤亭亭的生态女性思想

“我”心中的英雄花木兰这个人物体现了作者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人类与自然,男性与女性是相互补充,相互融合,平等共存的整体。在“白虎山学道”这一章节中,花木兰师从一对老夫妇。当木兰与他们重逢时,她看到“一对金人儿,在那跳着大地之舞……就像地球旋转的轴心。他们是光,是融化的金子在流变……舞者之一终究是男性,而另一个则终究是女性”。<sup>[15]</sup>他们时而是人,时而是自然,这一景象使人想起了道家的太极图中的阴阳双象,两者没有主次和尊卑之分,而是像“阴”和“阳”那样相互融合,互变互动。另一方面,花木兰是一个“双性同体”、“异体同构”式的人物,体现了作者的两性观。“我身体强健……为自己的强劲高大而暗暗称奇”,<sup>[17]</sup>催马杀向战斗最激烈的地方”。<sup>[18]</sup>她又在战场上生下孩子,战争结束后又回家服侍老人。可以说,花木兰身上具备了男女两性的社会性别特征:她高大勇猛,身体强健,坚强能干;她又温柔善良,充满了母爱。通过对老夫妇和花木兰的塑造,汤亭亭成功解构了父权中心文化和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观点。她将木兰刻画成勇敢、坚强、自立、理性的女勇士形象,表达了她的女性主义思想:女性的素质和能力不比男性差,男性能做的事情,女性做得也毫不逊色。

李培超先生曾指出,近代的人类中心、欧洲中心主义、殖民主义和男权主义都有密切的联系。<sup>[19]</sup>美国华裔女性身受异质文化和传统父权制度的双重压迫,处于“他者”、“边缘”、“失语”等地位。美国女作家苏珊·格里芬在《自然女性》(Woman and Nature: The Roaring inside Her)的结尾处写道:“我们能够战胜那些贬低自然、物质、身体和女人的思想;但只有女人学会用自己和自然讲话才行。”汤亭亭从自然和女性的双重视角进行文学创作,意在唤起人们对自然和女性的尊重和理解,唤醒人们的生态保护意识和男女平等意识,最终建立一个自然与人类,男性与女性均能相互补充、相互融合、平等共存的世界。

#### 注释及参考文献:

[1]陈茂林. 双重解构:论生态女性主义在文学实践中的策略[J]. 汉江论坛,2007,5:120.

[2]戴桂玉. 从《丧钟为谁而鸣》管窥海明威的生态女性主义意识[J]. 外国文学研究,2005,2:105.

[3]张子清. 与亚裔美国文学共生共荣的华裔美国文学[A]. 汤亭亭. 中国佬[M]. 肖锁章译. 译林出版社,2000:11.

[4][5][6][7][8][9][10][11][12][13][14][15][16][17][18] 汤亭亭. 女勇士[M]. 李剑波,陆承毅译. 桂林:漓江出版社,1998:12,135,129,145,172,132,144,173,174,42,185,179,24,33,36.

[19]李培超. 自然的伦理尊严[M].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129.

## The Woman Warrior in the Perspective of Ecofeminism

SONG Yang

(Literature College of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006)

**Abstract:** Through the perspective of Ecofeminism, this paper studies multiple female characters in Kingston's *The Woman Warrior*, including "No Name Woman", "crazy women", the mother Brave Orchid, and "I", and proposes the recognition of the connection of sign, status, symbol and experience between women and nature. And the character Mulan exemplifies the Ecofeminist viewpoints of Kingston: the nature and the humankind, as well as the male and the female are equal entirety of mutual supplement, integration.

**Key words:** Kingston; Ecofeminism; Nature; Woman

(责任编辑:张俊之)

---

(上接15页)

## On Application and Pragmatic Functions of Hedges in Legislative English

LI Ting

(Foreign Language Department, Guangdong Pharmaceutical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006)

**Abstract:** The distinctive features of legal language are preciseness and accuracy. However in practice, hedges are common in legal language. The present paper looks into the hedges in legislative language from the pragmatic perspective, analyzing the use and pragmatic functions of hedges, and points out that in this specific legal context, hedges are adopted to enhance the preciseness and stability of law and to maintain judicial justice.

**Key words:** Legal Language; Hedges; Accuracy

(责任编辑:张俊之)

---

(上接27页)

Chinese literature. It is worth to concerning "Public art", "Southwest Literature" and "Hongyan" for literary historians. These publications are important position to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In currently Chongqing literary history writings, literary historians have ignored these publications and obscured some real details of the literary history.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is issue and takes author view.

**Key words:** Public art; Southwest art; Hong yan; Literary history of ChongQing; Evolution

(责任编辑:张俊之)